

费孝通全集

第十四卷
(1992-1994)



内政部人口学研究所

费孝通全集

第十四卷
(1992-199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费孝通全集·第14卷,1992~1994/费孝通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3

ISBN 978-7-204-09796-8

I. 费… II. 费… III. 费孝通(1910~2005)—全集 IV. 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03231号

费孝通全集

费孝通 著

责任编辑 王东生 王占英 王继雄

责任校对 县翔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292

字数 7025千字

版次 2009年10月第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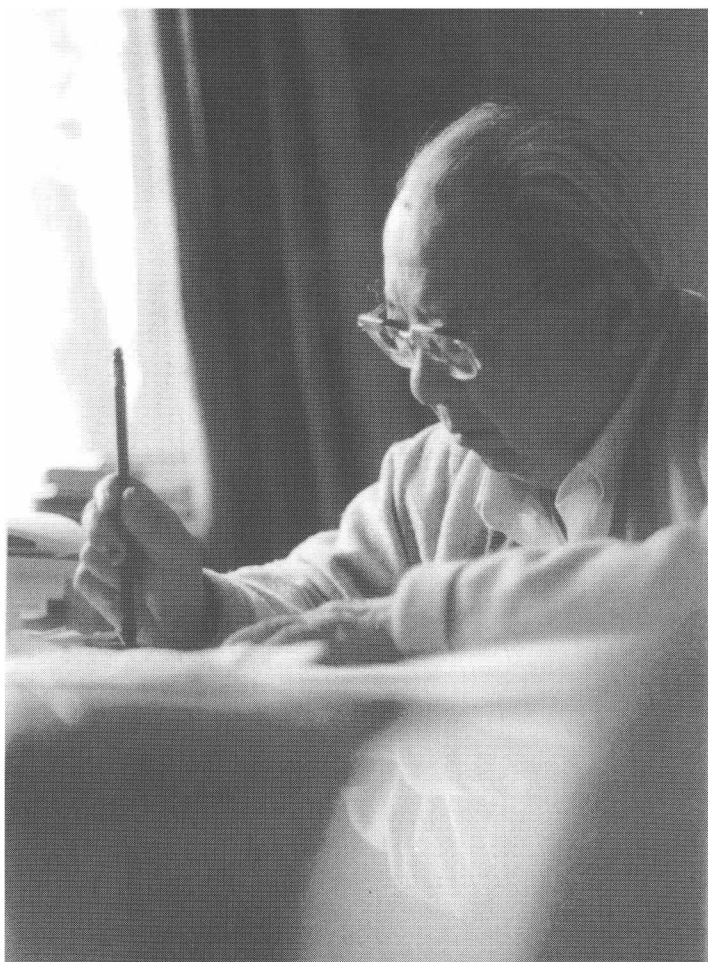
印次 2010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套

书号 ISBN 978-7-204-09796-8/C·212

定价 880.00元(全20卷)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20 世纪 90 年代的费孝通

本卷说明

本卷收录了作者 1992 年至 1994 年间所撰写的文章。

中国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道路是作者一生研究的课题，在这个时期，作者对这个课题的研究更加深入而广泛，一是撰写了《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近年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几个阶段》等重要文章，回顾了十年来对乡村经济发展的研究经过；二是将观察思考的视角从苏南扩展到了中部传统农业地区及珠江三角洲，撰写了《珠江模式的再认识》、《淄博行》、《信阳行》等文章，总结了农民创造的“公司+农户”的社会化生产模式，还提出了以香港为中心的三个环形带的区域格局。

本卷的文章一般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同时对个别同类课题的文章予以适当集中。在编校上，除对个别明显的排印上的错失予以纠正外，其余一律存其旧貌。

目 录

加强智力扶贫	(1)
重访民权	(5)
民富则国强	(19)
从当地实际需要出发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	(21)
珠江模式的再认识	(24)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35)
孔林片思	(39)
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	(45)
边区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思考	(62)
出口、腹地和交通网络	(80)
沂蒙行	(84)
解放思想 奋发图强 做出新贡献	(102)
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思考	(106)
中国乡镇发展的道路	(116)
府书记的十大营养蔬菜	(119)
猴年辞岁	(126)
乡镇企业的新台阶	(129)
寻根絮语	(137)
沧州行	(147)
社会学重建的回顾	(158)

《史记》的书生私见	(161)
邯郸行	(165)
关于教育的思考	(174)
泰安讲话	(181)
肥城讲话	(191)
选好角度 发挥优势	(195)
展视中国的乡镇企业	(200)
乡镇企业的发展与企业家面临的任务	(206)
对“美好社会”的思考	(211)
个人·群体·社会	(217)
略谈中国社会学	(241)
关于人类学在中国	(259)
顾颉刚先生百年祭	(266)
《逝者如斯》后记	(273)
接受福冈亚洲文化奖的讲话	(275)
淄博行	(280)
从农村发展到区域发展	(287)
面对世纪之交 回顾传统文化	(294)
近年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几个阶段	(297)
继承优秀文化传统 注入新的时代精神	(308)
中央民族访问团追记	(310)
人不知而不愠	(315)
《芳草天涯》后记	(332)
从史禄国老师学体质人类学	(335)
濮阳讲话	(358)

信阳行	(365)
焦作行	(376)
从蚌龙想起	(387)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	(394)
社会科学对中国农村发展的贡献	(398)
滨州讲话	(406)
《言以助味》后记	(411)
发挥每个盟员的作用	(414)
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	(422)
话说乡味	(429)

加强智力扶贫

多年来围绕着中共中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同时继续贯彻盟中央提出的“做好事，办实事，出主意，想办法”的精神，盟的各级组织做了很多扶贫工作。最近我们召开了智力扶贫工作经验交流会，检阅成绩，交流经验。就全国的扶贫工作来说，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可以说是沧海一粟，对各地方的建设发展，作用还不那么大，但方向是正确的，也受到了各地政府和群众的欢迎和支持，在全国扶贫工作向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转变的时期，意义是不寻常的，在民盟工作中是一件大事。

我常讲，我们生逢盛世，我国正处在一个重大转变时期，中国社会正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其最重要的标志是要从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国转变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困难和严重的问题在于，我国还有相当多的地区生产水平和生活条件还比较差。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改革和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绝大多数的地区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和进步，但发达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拉大了，出现了不平衡状况，尚有局部地区的农民群众仍生活在贫困线下。中共中央十三届八中全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对于进一步做好扶贫和地区间协调发展工作，促进共同富裕，做出了明确规定，指出“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是广大群众的普遍愿望。在允许一部分地

区、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的同时，必须进一步扶持少数民族地区、老革命根据地、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帮助贫困地区的农、牧民尽快脱贫致富”。说明我们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区别，我们允许有人先富起来，但先富者要帮助后富者，而且不允许贫富悬殊，造成两极分化，这就是扶贫政策的实质，也是我们要搞好这项工作的意义所在。

很多人提到扶贫要治愚，我很同意这一目了然的简单概括，这个“愚”并非指智力有缺陷，而是说缺乏现代知识，点出了后进地区的关键所在，我们要从传统的封闭的小农经济状态中，打开大门走向世界，必须同步进行发展教育，提高科技。在80年代初期，盟中央曾提出“智力支边”的口号，我们在边疆地区开展了工作，接着进一步参预了各地的扶贫工作，以提供“智力”，用知识和技术为贫困地区服务为己任，发挥了民盟组织的作用。

现在的形势，向我们提出了更高和更为紧迫的要求。一方面是90年代的农民，在生产和生活方面都得到了发展和提高，更迫切地需要现代知识，另一方面有科技知识的知识分子也迫切需要有机会与实际结合，更好地为社会为群众服务。民盟作为一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的组织，应当为自己的成员提供更好的条件和机会，能让他们为推动当地社会经济建设发展提供服务 and 做出贡献，所以组织好这方面的工作，是广大盟员的愿望，也是人人都有可能出力的工作，搞自然科学的可以做，搞社会科学的也可以做，在职的可以做，离退休的也可以做。广大盟员投身到智力扶贫工作中去，通过参加社会实践，不但服务于社会，也有助于自己认识水平的提高，能紧跟上时代的步伐前进，这对我们自身建设也是十分有价值的。

我自己一生做社会调查工作，经常接触基层干部和群众，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状况，也体验到贫困地区的民间疾苦，一

向有意用自己的知识为改善他们的条件而出点力。所以从 30 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现在，在我的著作和言行中，可以说贯穿了一个主导思想，这就是“志在富民”。在 80 岁生日时我再一次向盟内同志表示了这一决心和心愿。我仍将毕生为此而不断努力。我认为要使中国富强起来，首先要使中国的农民富裕起来。这 10 多年来，我花了相当的时间在各地进行实地调查，并出主意想办法，就是为了有助于他们提高生产力。如在沿海地区看到农村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自己感到极大的欣慰，在边区和民族地区看到启动经济的苗头，我也抓住不放。以“小城镇研究”和“边区开发研究”的课题，把各地发展的经验总结起来，传播出去，以更好更快地推动这一事业的发展。

我在民盟的工作中，也是力图按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学以致用”这一精神来办事的。民盟作为参政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参政议政，参政议政的实质是要求我们提出利国利民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从哪里来呢？只能通过长期的探索，从实践中来，从我们投身到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去寻找。开展智力扶贫工作，既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也帮助我们接触实际，了解国情民情，促进我们提出积极的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因此扶贫工作不但是我们的一项业务工作，也是一项政治工作。民盟的特点是有一批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各门学科的高级知识分子，怎么把盟员的力量调动起来，发挥集体优势，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这是我们的工作方向。

这次开会听到 10 多年来盟内各地所做出的成绩，一开始是到贫困地区去办学讲学，传递科技知识和进行项目咨询，以后逐步发展到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生产，搞活经济，制定发展规划，提高自我发展生产的能力。很受鼓舞，也得到安慰。特别我们历经沧桑的老一代，能在中国历史上重大转折时期中出些

力就将是最大的安慰。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指科技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讲的。因为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系统中的智能要素具有强大的渗透和凝聚力量。科学是知识形态的生产力，通过技术和教育它将渗透和凝聚到生产力的其他要素中去，使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智能化，使现代生产得到飞速发展，我们从来坚持人的因素第一，但只有组织起来的人民，并为现代科学技术所武装，才能起决定作用。所以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大有用武之地，扶贫工作最根本的也是求得生产力的发展，把现代化知识传播到贫困地区去，使之与群众相结合，以不断提高生产力。

我们的目标，到 2000 年在全国范围内要根本消灭贫困，全国人民达到温饱走向小康。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指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目前全国只有部分地区进入小康，那些尚未走出贫困或正在走出贫困的地区亟须奋起直追，我们有责任帮他们一把，现在我们的智力扶贫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也有了一些经验，要再接再厉，努力把工作推向前进，为改革和建设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1992 年 1 月

重 访 民 权

1987年清明时节，我去河南访问商丘地区的民权县，访问回来就想写一篇《民权行》，介绍淮海平原、黄河故道一带农村发展的一种模式，我称它作民权模式。这篇文章没有写成，流产了。次年清明，全国人大开会期间，我每天经过北京展览馆前和车公庄路，路旁盛开的泡桐花像似在提醒我欠下的这笔文债还没还。接着我去香港大学接受学位，事毕在招待所里候机返京，得半日闲，写了《泡桐花开》一篇杂文，刊登于《瞭望》的《珍珠滩》上。由于言简文短，只记下了年前在民权所见到焦裕禄治穷良方桐麦间种的事迹和感想，没有叙述民权模式的特点。

民权农村发展模式对我印象很深。从那年起，我在各地访问讲话时常常提到它，并把它作为内地农村发展可以参照的一条比较简明易行的路子。1989年在西安召开的一次关于城乡发展的学术讨论会上，我建议由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母青松、王蕴娴两位同志去民权进一步深入调查这个发展模式，作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进行的“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重点研究课题的一部分。1991年8月我接到了该课题的研究报告《城乡协调发展研究》论文集的清样，其中有民权模式一章。读完后，我决定重访民权，9月成行，行程一周。此行又过了近半年，利用春节空隙，写此文以了却多年来的一段心事。好在民权模式的产生经过、主要内容、基本特征和明显效益，母、王两同志已在“民权”章里详述，在这篇文章里，

我可以只写些个人的体会。

调整生态，开发草根资源

屈指一算，我恢复对农村的研究，从1981年三访江村起，忽忽已10个年头。中国实在大，尽管我马不停蹄地东西穿梭，还不过如春蚕啃桑、蜻蜓点水，从沿海到边区沾了一点边。至于广阔的中原腹地却尚少问津。如果以人口论，全国绝大多数农民还是居住在黄河和长江所冲积成的这片平原上，而我偏偏对这地区接触不多。80年代后期我已感觉到这个缺陷，所以1987年有了河南民权之行。

民权县地处河南东部，由于历史上黄河多次改道，在民权境内就留下了80华里的故道横穿东西。在故道和它的两旁形成了五大荒系，仅沙荒、盐碱和背河洼地就占民权全境土地的1/3。上苍赐予民权的自然条件已极端苛刻，再加上历年来的天灾人祸，旧社会给新中国留下了这一块典型的贫困地区。今天我们可以从最贫困的起点，逐步追踪到经过脱贫到温饱，和起步向小康迈进的全过程，总结这段经历，对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内地农村应当有足以借鉴的经验。

这段发展经历的起点，就是去年在银幕和荧屏上看到的反映焦裕禄一生的背景。民权紧靠兰考，解放初期这里也是灾祸连年，农民经常扶老携幼，离乡背井，就食他乡。看来不改变这地区的生态条件，人们生存都难于维持，根本谈不上安居乐业，改善生活。焦裕禄抓住了这点，在一雨便成灾的沙窝里植树造林，防风固沙，并创造性地找到了桐麦间种的办法，把防护林和用材林结合起来。这样做不仅促使这片沙碱荒地获得生机，又为千家万户开辟了增收门道。以造林植桐扭转沙化，变“黄”为“绿”，制止了生态恶化，恢复了土地生产力。这就

为这里的人民脱贫致富打下了基础。

民权农村的发展模式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母、王两同志在“民权”章里把民权模式的特征用一句简单而生动的的话表达如下：“从开发草根资源到发展草根工业。”这里包括两步，第一步是开发草根资源；第二步是发展草根工业。草根资源指的是土地所生长的植物资源，不仅是粮、棉、油等大田作物，而且包括林木、果树、灌木、蒲苇等等一切可以用来加工的原料。草根工业就是利用这些草根资源的加工工业。这两个概念比一般化的农业和农产品加工工业范围宽泛一些，却正切合民权的特点，因为民权的加工工业是以葡萄酿酒和以柳枝蒲苇编织开始的。

生态状况改善，土地生产力恢复后，民权便进入开发草根资源的阶段，这又成了经济发展的新起点。草根资源开发当然首先是粮、棉、油的开发。以粮食为例，1949年全县单产平均62斤，总产不过9675万斤。1953年建立了农业技术指导站，粮食产量有所提高，到50年代末翻了一番。60年代由于动乱，粮食产量有所下降，到70年代初总产才超过2亿斤，1975年达到3亿斤。但由于全县人均耕地只有1.4亩，仍然得吃国家返销粮，直到1985年总产超过5亿斤，人均约700斤，才解决粮食自给问题。如果只看粮食，民权的草根资源还是薄弱的，单靠它显然脱不了贫。

但是，植树固沙之后，民权就有了大片沙地可以利用了。由于这里昼夜温差大，光照条件好，适宜果树生长，加之人们有培种果树的传统，从50年代开始就有人在沙土上栽种葡萄，逐年发展，到1957年葡萄栽培面积已有3000多亩，年产葡萄3000多吨，成了解放后民权开发成功的一项重要的草根资源。

此外，还有大片背河洼地原来也被废置，自然生长的柳条和蒲苇取之不竭，任人砍割。农民们编织篮筐用的柳条和蒲

草，就是从这些洼地采集来的。后来编织工艺得到发展，柳条蒲苇又成了一项富民的草根资源。

1987年初访民权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大田里跟小麦间种的泡桐。民权在60年代就向邻县兰考学到了桐麦间种的经验，但是在1982年之前，农民种树的积极性不高，只在自己住房的墙外宅内种一些，出卖木材，贴补家用。农村经济改革落实后，桐树包给各户才兴起了种植泡桐的热潮。到1989年，全县70%的麦田实行了桐麦间种，总共种植900多万株，人均13株，也成了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总的说来，民权通过生态调整，开发了草根资源，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根本性的改善，不再逃荒讨饭，能够安居生产了，但是生活水平还是很低的，1978年人均收入只有47元，显然是在贫穷线之下，所以民权被划为全国贫困县之列。

葡萄酒，发展草根工业

草根资源的开发为发展草根工业提供了条件。但是如果 not 跟着资源的生长去发展加工工业，资源的开发也就无法继续下去。民权的葡萄生产给我们一个正面的生动例证。

上面我已说到1957年民权的葡萄生产已达到3000吨。这样大量的葡萄是分别由各公社的生产队经营的，产出的葡萄由商业机构收购。葡萄成熟期短，保留不易，这样大量葡萄几乎同时上市，收购困难，运销更困难，于是便发生了“卖难”的问题。那年8月上旬就有50吨葡萄因停留在民权发往北京的列车上而发霉腐烂，受到警告，后来又上了报，引起了上级政府的关注。1958年由轻工业部和农业部协助，在民权兴办了一个县办葡萄酒厂，日益增产的葡萄因此可以就地加工了。果农的生产有了保障，积极性更高了。可以说民权酒厂的创办

是民权走上发展草根工业的开始，使它的经济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农村里办工业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我过去常说农业里长出工业来是我们新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但是在这个“长”字里却大有文章。民权在历史上没有办过现代工厂，也没有酿酒的传统，又是个贫困地区，农民没有多余的资金来买机器、盖厂房，不可能像苏南那样由公社或生产队自己兴办工厂。民权这个酒厂是个由上级政府资助的县办工厂，性质上是地方国营企业，而不是社队企业。当地草根资源的开发、葡萄产量的提高固然是促成加工工业的内因，但如果没有上级政府“以工保农”的政策，这个酒厂是办不起来的。在这点上民权模式和苏南模式是有区别的。

作为地方国营企业，这个酒厂在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下，不仅可向公社、生产队下达种植任务，而且用行政手段收购果农的产品以保证所需的原料。这对农民来说，固然解决了当时的卖难问题，但收购量限于酒厂的生产规模，民权的这一项草根资源的产量也就受到了限制。因之，从1958~1983年是该厂“默默无闻的25年”。在这段时间里外面的世界却起了变化。80年代的改革开放政策把民权这个地方国营的小酒厂投入了竞争激烈的全国性市场里。由于规模小、设备旧、技术差、质量低、经营不善，这个厂无可避免地进入困境，1983年产品积压达4000吨，濒临倒闭。

1984年民权酒厂“引进”了以潘好友为厂长、朱永勤为书记的新的领导班子，起用了富于创新精神和知识的人才，对已经僵化的体制进行了深入的改革。他们决心冲进市场，投入竞争急流，在风浪中学习游泳，终于把这个偏僻小县的小酒厂经营成了饮誉中外、荣获国家级“金杯奖”的名牌酒厂。

民权酒厂改革的路子是从扩大市场、提高效益的实践中摸